

房山石经拓印面世一甲子记

吴梦麟 张永强

房山石经的镌刻始于隋末唐初，全盛于盛唐，至唐末五代而中断，但至辽金时又转盛，元、明时期只有少量的补刻。前后历时千年，15000 余石、拓片30000余张，是我国目前保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石刻大藏经，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宗教价值和艺术价值。1956 年春，国务院批准的一项罕见的文化工程正式拉开帷幕，那就是对“房山石经”的勘察、捶拓、整理研究。1956 至1958 年，这项工程始终得到了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关心和指导。谨以此文铭记对房山石经调查研究六十年来的征程和磨难。

勘察捶拓“房山石经”的缘起

在国务院宗教局向习仲勋秘书长的上报文件中记道：“房山石经的拓印原是1955 年为配合东南亚一些国家‘佛灭2500 年’而开展的对外宣传工作，同时也是为了整理罕有的历史文物经批准进行的。”之后为发掘地穴还向当时的文化部做过请示。1958 年后房山县从河北划归北京市。经多方商量，房山石经山顶和云居寺内的两处藏经被开启和捶拓。

石经山洞窟的开启

1956 年春开始了发掘筹备工作，4 月21 日佛教协会副会长、著名佛学家周叔迦邀请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曾毅公先生亲临石经山现场主持开洞仪式，并确定首先开启第3 洞作为试点，然后再逐洞全面铺开。在拓

印过程中，坚持按规定程序进行，即先将经版从洞中抬出，轻搬轻放，放到预先建的工棚中清洗干净，编号拓印，保证经版的安全。为了使工作依考古方法程序进行，将下层两座洞编为1、2号洞，上层自右向左依次编为3至9号洞，其中只有5号洞雷音洞又称华严堂，是唯一可出入的，其他8座洞依创刻僧人静琬的意愿，呈封闭式。石洞门上部开直棂窗，以便通风，整座石门以铁水灌注。第3号洞开启后看到洞内经版放置较散乱，一般是下层立放、上层横放或平放，无规律地叠压。捶拓后再按原洞放回。一切就绪后再将石门安好錮封。令人痛心的是，过去对洞内石经已有过搬动破坏，致使洞外还有残经版，所以在工作过程中，也十分注意洞外残碑的保护与捶拓编号，有些重要碑刻因此被保护，如唐总章二年（668）题记、开元十四年（726）或廿四年（736）年《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等。山上9个洞的经版捶拓一直延续到1958年初才完成。在黄炳章先生的带领下，一支专业和业余的拓工队伍又转战到山下云居寺遗址的地穴处。

云居寺南塔前藏经穴的勘测、发掘与捶拓

中国佛教协会在1957年5月考虑到捶拓南塔地穴中的藏经，要先进行发掘才能往下进行，曾向文化部文物局上报申请发掘地穴。1957年暑假期间，周叔迦副会长还邀请北京大学教授阎文儒，北京大学青年教师俞伟超、文物局王去非等来到云居寺地穴进行发掘工作。当时南塔遗址已夷为一片废墟，杂草丛生。1957年8月1日开始勘测，经过商量研究，决定首先清除原塔基上的土丘，8月6日露出了塔基座台，十分完整。塔基中心砖砌一地穴，内置石函一件，塔台北面立有已倾倒的经幢多座，其中辽天庆七年（1117）志才撰《大辽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最为重要。8月7日下午，在南边探沟左端发现经版，从而找出了地穴的四至。

地穴南北长约19米，东西宽约10米，深5米，地面铺墁方砖，边沿整齐。南北两穴所瘞经版排列形式不同，北部经版是一排排顺序排列、南部经版则是纵横交错排列，瘞藏经版六层，北部藏经6295石，南部藏经3787石，共计10082石。该地穴共分三次瘞藏，之后再未被动过。此次应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佛教石经最丰的一次。在地穴底部第六层还出土一件石函，函的正、侧面均刻题记，为辽天庆七年（1117）敬装，函内藏有银净瓶、释迦牟尼佛舍利、香炉等。1958从年初山上全体拓工转至寺内，开始了又一项大的工程——捶拓地穴瘞藏经版。

黄炳章先生生前告诉我们，他们从事的筹备、启洞、发掘、管理等一系列工作，其艰辛一言难尽。仅捶拓石经七份，每份三万余张，就用去了近1500刀宣纸、280多斤墨。今日珍藏在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上海古籍图书馆、东北大学（今吉林社科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拓片，已作为二级文献。

以上两处捶拓工程圆满结束后，因当时的历史原因未能作为礼物参加纪念活动，但中国佛教协会不失时机地组织了专业人员开始了漫长的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

法源寺中的房山石经展和整理

1961年我从北大毕业参加工作后，经常到法源寺，向周绍良、黄炳章、任杰、胡继欧等先生请教，并观看“房山石经展”，看到他们戴着老花镜，逐字逐句地校勘、研讨，那种甘于寂寞、兢兢业业的精神令人敬佩。半个世纪以来，多部关于房山石经的著作和论文问世，房山石经的价值逐渐呈现。先后出版了《房山云居寺石经》（文物出版社，19789年）、《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

《房山石经·辽金刻经》（23卷本，1986—1989年）、《房山石经》（30卷本，华夏出版社出版，2000年）、《房山石经研究》（吕铁刚主编，香港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1999年）等巨著。

云居寺管理处出版了《房山云居寺贞石录》（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云居寺老照片》等。台湾陈艳珠女士出版了有关房山石经题记和研究通理大师、辽金刻经的著作。以上这些著作的面世，将房山石经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改变了这一显学沉寂的状态。

学术研讨与“申遗”

“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居寺管理处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召开学术研讨会，季羨林先生对房山石经给予高度评价，将它与敦煌石窟的价值并列，许多政协委员纷纷提案，要求将“房山石经”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将来可将采石遗址、磨碑寺及瘞藏石经“三位一体”的格局推向一个保护管理的新高度，真正让云居寺塔及洞窟石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新发现文物不断面世

云居寺各届领导均重视寻找已佚碑刻。20世纪80年代时，再次发现已佚的元代贾志道《重修华严堂经本碑记》残石，还陆续发现了若干刻经残石。通过跨省考察，吴梦麟先生在旅顺找到了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房山石经山《唐贞观八年题刻》的后半部。1980年，又在雷音洞内地穴发现隋大业四年舍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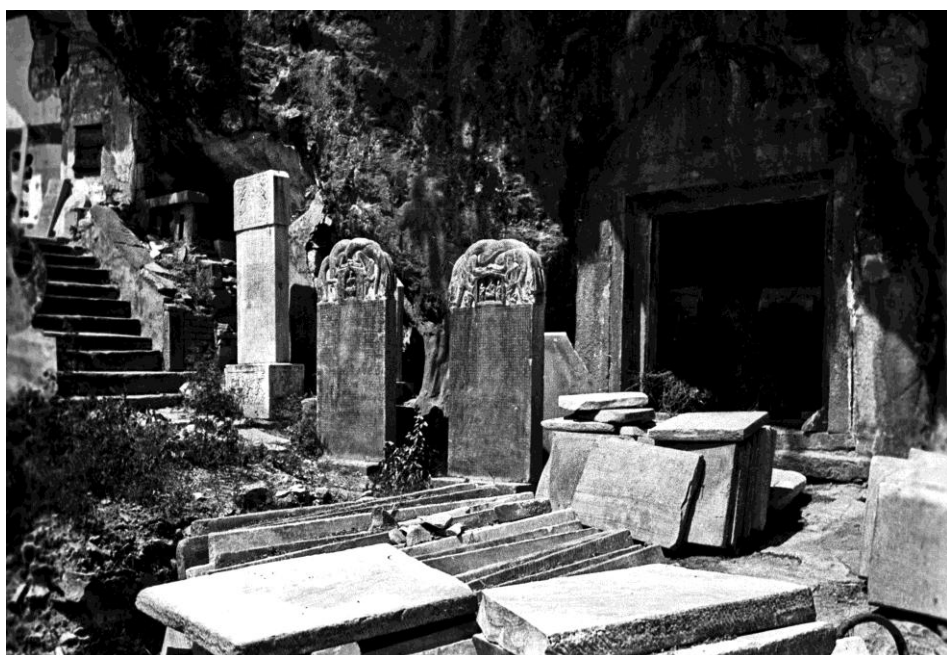
通过多年来的资料收集和实地考察，我们还发现了唐刘总所刻《佛本行集经》拓片，与房山石经有密切的关系。另

在石经山上又发现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唐代题记、题刻，都为房山石经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如石经山顶比丘玄岸题记、唐大历元年十月十九日范阳郡薛伯俞题记、郑云题记，一洞门前金大定年间定城杨杰题记，以及原立于南塔前经幢上的重要题记等。

未来展望

六十年来，房山石经研究的艰辛和成果有目共睹，展望未来可谓任重道远。为了让这处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永世长存，建议如下。一是继续做好“房山石经”的保护与研究，争取早日“申遗”成功。二是培养从事古代建筑、考古、科学保护的年轻专业人才，使现今的管理机构逐渐向管理及研究型发展。三是有计划地与北京文物部门联合，开展科研活动。四是对石经中的书法、美术等内容进行整理，编辑专门刊物，出版碑帖。五是积极开展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和巡展活动。

六十年的历程，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路漫漫，但必有后来人。







金輪轉神皇帝及師僧父母

清信終宋小兒敬造上

摩訶薩也如是作依其心所有種種家生之類皆由是
 之如是或度無量無數無邊家生得成菩提者
 於布施所謂不極色香味觸法有種種善
 室可思量不齊也世尊菩薩摩訶薩如法行
 見如來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何人相與相善
 此為實當知是人不放一微二微三微四微五微
 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家生無須我相人相家生相善
 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
 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
 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
 所得福德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
 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
 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法者是
 來而實無來是故名阿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
 得阿羅漢道即為普天人眾生壽者世尊佛說我
 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
 世尊如來在迦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 須菩提
 薩應如是其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
 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須菩提
 數何況其沙彌若提我今所言去法若有其
 如佛塔廟何況有人蓋緣受持種種善法
 何名此經我禁云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
 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
 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與非世與是名世
 須菩提古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恒河沙等身會